

二、文學史的意義

1. 畫

远去的背影

2. 過去

紀念朱自清新文學研究論文集

3. 文史

a. 總集

b. 詩文評

文學史中的文學
外來傳統的吸收發展

李同林的對象
英美社會的文化

4. 文學史的對象
a. 作品

b. 作者

c. 讀者

藍棣之/解志熙○編

一、又與文學
1. 又的意義

a. 錯畫

b. 清華大學中文系

c. 又的意義

d. 文的解

e. 文學

2. 文學的意義

傳統的

文學

文章

b. 外來的

西方傳統

現代發展

c. 文學放

文學重學

文重文

1. 遊戲「遊戲」，象徵「文學」，作文，
文字「文字」，義出於此。

博志篇，以讚養助基，人言「杜筆」，
目漢至魏四百年，辭賦。

文心雕龍（六七九）

端：「在手文章，亦患凡俗。」

6. 韓徵（580-643）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今次其前後，并解釋年譜，

6. 韓徵（580-643）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今次其前後，并解釋年譜，

远去的背影

清华大学中文系
纪念朱自清新文学研究论文集

蓝棣之/解志熙◎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背影/蓝棣之,解志熙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

ISBN 7-5004-3538-X

I. 远… II. ①蓝… ②解… III.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788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责任校对 韩天炜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华丰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8.875 插 页 2

字 数 534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定 价 3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盼望

最近的将来多出些现代研究的专家
这是我们最不可少的

朱自清



重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代序)

徐葆耕

为了纪念我们的老系主任、缅怀他对中文系的贡献，也为了借助他的英名广邀海内外学长来清华传经送宝，我校建立了“朱自清荣誉讲座”，并于今年5月正式揭幕。这是中文系复建以来的一件大事。我们一定要长期地坚持做下去。

朱先生的历史性贡献之一，是于1929年率先开出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并把它纳入教学系统，由此开始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本书主要是集录我系同人在现当代文学以及相关方面的部分代表性论作。这是后继者呈献于先贤在天之灵的纪念，同时也是向海内外同人汇报我们系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状况，以求监督指正。

一

李广田先生说，“朱自清”三个字已同《背影》成为不可分的一体。

《背影》中那蹒跚地爬过铁路的老人的背影已经化为一种文学意象，它包含两重相悖的含义：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中绵延不断的父爱的缅怀；另一方面，“背影”又意味着同过去（传统）的惜别。当朱先生写作《背影》时，他自己也正在成为历史的“背影”：他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生命，把这种父爱扩展为对时代、对民族和人类的大爱，竖起了一座20世纪的精神丰碑，而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正在使先生的背影因远去而模

糊。伫立在水木清华池边的先生的雕像，时时令人感到他的寂寞。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背影是永存的。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就是由一系列的“背影”构成的。时光流影，逝者如斯，一些背影在消失，一些背影在重塑。伽达默尔说：“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 (Vorgegenstand lichend) 行为，以至于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异己的东西——他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真理与方法》第379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当我们把朱先生当做对象来缅怀、当作范例来借鉴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正在溶入其中，成为传统的延续；同时，我们又同时代一起在寻找新的路。在寻找之中我们自己也在化为历史和历史上的“背影”。

二

1917年始建的清华大礼堂里，高悬着一块匾额，上书：“人文日新”。去年，九十周年校庆时，这句经典话语又被镌刻在大理石上，伫立于西校门的入口。

裘锡圭先生曾对我说：“清华的传统就是求新，国学院四位导师搞的学问在当时都是很新的东西。”我想，对朱自清先生的学术也应作如是观。就新文学的研究而论，朱先生的工作

更富于开拓性与前瞻性。

朱自清于1925年受聘清华。当时，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开拓了新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在大学里依然没有地位。大学的国文系或中文系只讲授国学或中国古代文学。朱先生到校后力倡改革。当时的系主任杨振声先生回忆说：“关于系里的事，我和朱先生商量的最多。在办系方面，中文系与其他大学不同之处在于古今融汇、中西贯通。”1926年朱先生发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针对当时的复古空气，说：“要知道单只凭着若干种传统，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他引用《论衡》说，知古不知今为“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我们现在非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不可。我们得走两条路：一是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与俗曲）的学术价值，二是认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朱自清全集》第4卷196页）他呼吁说：“我盼望，最近的将来多出些现代研究的专家，这是我们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紧的，先要打破那‘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那崇古轻今的风气：空冒无益，要有人先做出几个沉重的例子才行！有‘现代的嗜好’的人努力吧！”1929年，先生以身作则，率先开出《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作出了一个开拓新学科的“沉重的例子”。

据整理朱自清有关新文学研究讲义的赵园先生讲，先生在三年之中，光讲义就写了三种，讲义之中还有数不清的插条和补充段落，可见用力之勤。当时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不过十几



年，但精神的解放与激情的喷涌已经创造了多彩多姿的文学。将这些看起来五光十色、令人神眩目迷的文学现象整理成系统，这是需要勇气和功力的。它不仅要求作者具有开阔的视野，而且有缜密的研究。经过整理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体现了朱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谨严而不繁琐，专门而不孤僻，基本的立场是历史的，客观的。”（王瑶：《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见《最完整的人格》，第62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原创型教材，至今读起来，仍有一股清新、厚重之感，特别是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极富个性化的分析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先生的课程受到青年同学的欢迎，也引起其他学校的注视。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曾请先生前往授课。王瑶先生当年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之所以舍北大而就清华，原因就是清华开有新文学课程。

据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每逢学术发展遭逢危机，必有新的学术范式出现。余英时先生认为，在20世纪初，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恰好是在当时的学术危机中，适应了建立学术新典范的需要，而成为在整理国故方面体现新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的“新范式”。余先生的说法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但需要补充的是，在学术危机时期，“新范式”的出现，并不是单个的，而是多元的。18世纪西欧古典文化范式遭逢危机后取而代之的“新范式”便不止一个。20世纪初期，作为对实证主义理念及其学术范式的挑战，据韦勒克言，至少有五种新的



文学研究思潮出现，各自有不同的理念、价值和技术系统，研究范式也有不小差别，无法互相取代。20世纪初叶的中国学术危机，带来的也是一个多元化范式层叠出现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对于蓬勃生长的新文学运动进行系统而专门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申报》创办（1872年）以来的文学发展进行了梳理，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完成建立新范式的任务。创建对新文学进行系统而专门研究“新范式”的任务是以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开端的。由朱先生开始的这个新范式在价值理念与技术系统方面至少有如下新特点：第一，重视当代生活与文学现象的学术价值，这是中国学统中所没有的；第二，把一国的文学现象同世界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研究，把中国的新文学看作世界文学发展的一部分；第三，承认文学发展中多种流派的平等并存；第四，把文体（诗、小说、散文）作为宏观叙述的重要支柱；第五，把历史的宏观描述同对作家及作品的个性化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做到宏观上的开阔，又注意微观上的缜密。朱先生治学谨慎，此《纲要》生前一直没有发表，但通过教学传承，仍起到一定的范式作用。1931年以后，朱先生虽然不再开新文学课，但却没有终止新文学的研究，时有论作问世，对喜爱新文学的学生的课外指导也十分认真。联大时期，沈从文、吴组缃、冰心等开设新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课程，是《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的承续和发展。但作为学科，这些课

程还是零碎而不系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成较为科学而严密的体系应是50年代以来的事。作为系统学科的得力建设者之一的王瑶又是朱先生的研究生。朱先生建立的研究范式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影响是明晰可辨的。

新文学史研究从萌生到终于在现代学术中占有一席之地，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如所周知，20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现代学术，是与新文化、新文学相伴而生长的学术新潮，它与旧国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学术观念和方法是现代的，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是开放的，古今中外，一律平等，皆在研讨之列。就此而言，新文学以及现代社会生活理应是现代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包括新文学和现代社会生活研究在内的现代学术，则是不健全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新文学在很快成为文坛主流后，却长期得不到学术界的重视，长期被拒于大学讲坛之外。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其一，当时的学者或许以为，新文学为时尚短，需要一个历史的自然淘汰和沉淀过程，并且它用现代白话、靠现代印刷和新闻媒体畅行无阻，因而无须——至少暂时无须学术介入，只任人们自由欣赏和即兴评论就行了。这在学术上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其二，在当时，新文化和新文学虽然已被社会承认为大势所趋的主流，但由于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旧国学者在许多大学的既成权威和既得利益并未动摇，他们的学术倾向仍是主导性的。他们压根儿瞧不起新文学，当然更反对研究新文学了。其三，在

为数不多的支持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如北大、清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尽管也开创了不同于旧国学的现代学术，但这现代学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为了与旧国学争胜、向旧国学示威，也大多以“古”为对象——所谓“疑古”、“整理国故”、“释古”、“考古”，几乎无往而非古，旨在表示旧国学家自以为高古难能者，新的现代学术未必做不到、倒可能做得更好！应该说，现代学术的这一仗是必须打的而且打得很漂亮，其成就和水平超越了旧国学。但在这过程中，现代学术也渐渐走上了偏至而不知返、偏枯而不健全的路：所谓现代学术几乎等于“新国学”，现代社会生活和新文学几乎不在其视野之内。并且，在与旧国学争胜的过程中，现代学术的创建者们也未尝没有受到旧国学者好古、尚古观念的传染，加上对研究的语言文献难度的片面强调和对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价值自足观念的简单理解（如胡适所谓弄清一个字的含义的价值不亚于发现一颗行星），所以，现代学术的创建者们到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不但逐渐与旧国学者们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不约而同地把青年学子们一股脑往“古纸堆”里引，仿佛天下学问尽在于斯，而且在把新文学排斥于学术研究之外这一点上，有时居然与旧国学者惊人地一致。如受胡适影响而又被胡适树为整理国故典范的刘文典，据说就曾轻蔑地排诋在同一所大学教新文学习作课的朱自清、沈从文。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罗常培对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坛的拒斥态度，也几乎与顽固的



守旧派文人并无二致。这一切都表明，在20世纪20、30年代之际，学术界对新文学以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学术价值的认识还很不足，所以要把它引入学术殿堂和大学讲坛，是相当困难、颇有阻力的事。而朱自清独特的学术识见、过人的学术勇气和他为健全现代学术和大学文学教育的良苦用心，亦可由此覩见。为此，朱先生等先驱者经受了今天几乎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曲折。即是在朱先生掌系的清华，新文学课程也得不到许多人的认可。朱先生的课程开了三年，终于开不下去，《中国新文学研究》像一个空头招牌挂在教学计划里却无人讲授。1939年，系里还有的教授公然宣称：“中文系就是研读古文的系，爱新文艺的就不要读中国文学系！”朱先生当即反驳说：“我们不能认为学生爱好新文艺是要不得的事。我认为这是好现象。我们应该指导学生向学习白话文的路上走。这应是中文系的主要道路。研读古文只不过便利学生发掘古代文化遗产，不能当作中文系的惟一目标！”（《朱自清年谱》第208页，姜建吴为公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朱先生在强调新文学的研究时，丝毫没有轻视古代文学的。先生自己开了多门古代文学课程，并且在研究中致力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的会通。

当时，反对开设新文学课程的理由中还有一种是：“问世不到十年的文化成果不能进课堂，否则会丧失大学殿堂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种说法，源于牛津学者纽曼的大学理念，即

“大学是传授经典的场所”，大学的任务在于古典文化传统的保持。只有经过时间考验，构成经典的知识才有资格进入课堂。这种理念，至今也不能认为“过时”。但在19世纪末，一种新的大学理念诞生，即研究型大学。这种理念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的殿堂，而且是“创造”知识的场所。学生从一入学即应参与知识的创造，在创造中学习。按照这种新的理念，学生在进行研究时，不可能脱离眼下的现实，即是在研究古代经典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同当代的文化现象联系起来，“十年之内的成果不能进课堂”的说法自然被打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文学研究》课程中包含着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刍思。

从朱自清先生最初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至今，时过73年，新文学已经大大向前发展，新文学的研究也已非昔日可比。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都已从幼苗长成大树，成为大学中文系不能忽视的学科。当我们重温这个学科的成长历史时，我们无法忘记，第一个举起锄头的拓荒者和在这条路的起端为我们树立的第一块界石。

三

现在，人们常常讨论：“什么是知识分子？”旧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已经不能包容。人们不能不承认，知识分子应该两



分：思想型的和技术型的。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受到社会的青睐。就人文学科而言，也有思想型与技术型之分：对已有的经典进行考证和注释是属于技术层面的工作，它的价值是不待言的。但只有在考释中阐发自己的新思想者，才可称为思想型的工作。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中国学术传统是重技术、轻思想的，思辨型、批判型学者尤其罕见。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人文学者的本职应该是提出时代所要求他提出的问题，并给予自己的解答。但在大变动的时代面前，中国的学者常表现得苍白无力，像鲁迅、胡适、闻一多、朱自清这样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给以应有的回应者太少。也有一些年轻人，把思想型知识分子理解为“海派”式的空谈或对西方时髦思潮的浅薄跟踪。他们的学术空谈，像一艘纸帆船，在社会的洪涛之中很快就倾覆下沉，消失的无影无踪。历史是如此吝啬，它只给那些以严谨科学态度治学的思想者以机会，让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获得时间的肯定，成为人类探索和创造文明历程中的铺路石子或是挺立于路边的界石。

几乎每一位有见识的学者都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的不协调：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社会与人，而本来应该相应发展的人文社会学科却进展迂缓，特别是人文学科。当科学技术在开拓自己的未来时，人文学科却习惯于返回历史，返回古代。这种返回的必要性当然不容否定，因为我们必须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但是，若以

为靠经典和经典的阐释就可以回答今天的全部学术文化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严重的学术危机，正在无情地冲击着已有的学术范式，冲击的结果，使其中的一部分愈加坚强有力，而另一部分则被消解。我们预感到，未来的三、五十年内，中国乃至世界的人文学科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全球化大趋势的影响下，现代科学技术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同形态文化之间的相激相荡、相融相汇将有力地推动上层建筑的革新。行将到来的文化革新，其广度和深度都不会低于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新的学术范式将要层叠出现，这是毫无疑义的。谁能把握住未来发展的取向，谁就可能领先。中国人文学者应该抓住机遇，像朱先生那样，敢于开创，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我们的责任，裘先生所说的“清华传统就是求新”尤其具有启示性意义。如果我们不求新，就是背弃现代的学术传统。如果在求新中，忘记了朱先生等先贤的严谨、科学的作风，同样是一种背弃。中国现当代文学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学科，从来没有划地自限的传统。因此，应该鼓励多方向、多层次、跨学科、跨国界的探索和创新，例如，如何在对中国古典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更深刻的把握基础上实现“古今会通、中外会通”乃至“文理会通”？如何从方法论的高度上借鉴中国传统与外国的研究理路，独立地探索和提出新的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如何把学院派的研究与生动活泼

的当代文学现象相结合、实现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宗师，把对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关注视为最高使命，中国与世界的种种逼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是他们研究的兴奋点所在。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百年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极其珍贵的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在学术研究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是清华中文系复建必须谨遵的方针。

四

最近，我的一本小册子《紫色清华》在台湾出版。作序的是原新竹清华大学的教务长、代理校长李家同教授。他的序《从朱自清的梦来谈大学精神》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朱自清先生的意义：

“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其实永远是由这所大学的教授来代表的，如果这所大学有一批有学问，而又有崇高道德的教授，这一所大学就会成为被人难以忘怀的大学。……我们必须承认，大批有学问的教授之所以努力念书，也不一定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追求世俗的利益。谁都知道，有一些经济学教授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不替整个人类谋福利，却替一些商业团体操作衍生性金融产品，这种大师级的教授，只有学问，却没有理想主义作为他们的人生准则。一所大学，有再多这种

大师，也不会有什么伟大的大学精神。

“我们不妨看看全世界的大学，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大师的卓越大学，但是在这些大学里面，我们能够找到傅斯年、梅贻琦、陈寅恪和朱自清的影子吗？

“我们都念过朱自清的《背影》，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似乎又看到了朱自清本人的背影。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因为他正离我们而去。不仅如此，我甚至有一些紫色的哀愁，因为他所代表的那种理想主义，也渐行渐远矣！”（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

李家同教授是资深的电脑专家，又是教育家。我相信他对世界大学的了解与判断。理想主义的匮乏是时代的病症。对于不加分析地崇拜诺贝尔奖得主的人，他的话也是振聋发聩的。

当我看到，大批卓越的青年人被五光十色商品诱惑席卷而去、甚至堕入深渊时，我对“传统就是求新”产生了一种感伤和怀疑：我们在学术上毫无疑问应该求新，甚至也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实现了跨越，把学术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应该怎样求“新”？“新”的境界在哪里？事实上，我们时代人们精神上致命的萎靡、道德水准的下沉、极端利己主义的膨胀，在很大的程度上还需要靠中国传统与世界先进精神联合起来加以拯救，其中自然也包括朱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践履了朱先生等先驱者的精神，而将自己的为人与为学提升到攸关人类精神文明